



二代留守儿童正在经历怎么样的生活，是否会走上父辈们的老路？我们还不知道。

爷爷去世后

“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类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2013年，张丹丹获准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灰暗、阴郁的环境里，除了那一张张20多多的面孔，一名服刑人员的这句话多年后仍然萦绕在她的脑海里。

2012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张丹丹一直关注流动人口与犯罪问题研究。

“研究资料显示80%的犯罪都是流动人口作案，流动人口是犯罪群体的主体。但是当我在城市层面上寻找城市的犯罪率和城市农民工比重之间的关系时，根据全国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样本，却发现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既然农民工比例高并不必然增加犯罪率，为什么统计数据上显示农民工是犯罪的主体呢？”张丹丹表示，要回答这个问题，只在城市层面上研究是不够的，要落实到个体上，因为犯罪还是个人行为，要细化到这个层面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犯罪。

第一次去监狱时，张丹丹有些不安，带了20多个男学生，还在当地经过了培训。“到后来慢慢适应也就无所谓了。”她参照美国的监狱服刑人员调查问卷，翻译设计出两套关于犯罪认识的问卷，每套都有十多页。

针对“留守儿童”这一指标，张丹丹设计了包括个人及家

庭背景信息、犯罪历史、心理及性格特质、认知、行为偏好等多个模块的调查问卷。“要识别他们是否有留守儿童背景，就要问他们是16岁之前还是之后和父母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是跟谁在一起，没有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为什么没有在一起，是因为父母离婚还是父母外出打工了等等。”张丹丹介绍道。

抽样调查后，张丹丹发现有两个因素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群体的犯罪行为。一个是出生地的性别比——如果老家男多女少，他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另一个是有无留守儿童的背景——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犯罪的可能要比普通农民工高出17.3%。

这个数字看似不高。但在2013年，张丹丹的调研对象平均年龄在29岁，往回推13年，即2000年时平均16岁。因此，他们大多属于2000年之前被留守的第一代，大部分是80后。而当时，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在2000万左右。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100万左右。换言之，那十年里，留守儿童的数量翻了3倍多。

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只看大数据，为了搞清楚“留守儿童到底为什么会犯罪”，张丹丹又从服刑人员的样本里找了七八个符合条件的，比如16岁之前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的，不同的犯罪类型，做了较为深入的访谈，“每个人大概都聊了3个小时”。

“我觉得他们在情感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张丹丹讲到了一个当时20岁出头的男孩，因为抢劫被判了18年。小时候，他常年留守，怨恨父母，跟爷爷关系最亲。入狱前，他在珠海通过做传销已经有房有车，还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直到有一天，得知从小照顾他的爷爷得了癌症。他放弃在珠海的工作，赶回湖南老家，拿出全部积蓄给爷爷治病，但老人半年后就去世了。

“他整个人特别消沉，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依附于爷爷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一蹶不振了。后来他为了‘东山再起’，跟一个团伙合作抢银行，帮人开车，结果被抓，判了十几年。”张丹丹总觉得这跟他留守的经历，以及亲情的缺失很有关系，“他们的情感依附性都比较高，一旦这个东西被打断，就会有一些影响”。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服刑人员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因此，这群人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

韩国电视剧《少年法庭》剧照。

